

## 特约论文



刘艳华, 管理学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安徽工业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建设专门委员会委员、《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青年编委、国家自科项目通讯评审人、国家社科项目通讯评审人、教育部研究生学位通讯评审人, 担任多个 CSCI 期刊审稿人。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和政府委托课题 10 余项, 其中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被国家自科委管理科学部后期评估为“优秀”; 独撰学术专著 1 部,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 其中国家自科委管理科学部 A 类期刊收录 3 篇。

## 小额信贷机构愿意继续帮扶脱贫户吗? ——基于政银关联和委托代理的调查与实证分析

刘艳华, 陈佳, 管璇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32)

**摘要:** 从政银关联和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小额信贷机构 (MFI) 对脱贫户帮扶意愿形成的理论逻辑, 基于小额信贷机构帮扶意愿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利用 Ologit 排序模型对影响 MFI 帮扶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以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为基础的政银关系和信贷帮扶机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是影响 MFI 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主要因素; MFI 的帮扶意愿程度总体较低, 但农村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高于商业银行, 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高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政银合作和信贷帮扶激励会显著推动 MFI 对脱贫户的帮扶,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会显著降低 MFI 的帮扶意愿, 而帮扶效果和扶贫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对推动帮扶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 应明确 MFI 的社会责任, 进一步优化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机制, 针对不同类型的 MFI 实施差异化的激励和约束政策, 提高脱贫户的生产创收能力和信用意识。

**关键词:** 小额信贷机构; 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 帮扶意愿

**中图分类号:** F 832.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2415/j.issn.1671-7872.23093



## Are MFIs Willing to Help Poor Households ?

——An Investig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ank  
and Principal Agent

LIU Yanhua, CHEN Jia, GUAN Xuan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收稿日期: 2023-06-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BGL68)

作者简介: 刘艳华 (1979—), 男, 山东新泰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引文格式: 刘艳华, 陈佳, 管璇. 小额信贷机构愿意继续帮扶脱贫户吗? : 基于政银关联和委托代理的调查与实证分析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1(1):98-108.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bank associ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urvey and analysis of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the Ologit ranking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bank relationship based on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control, as well as the principal agent relationship in the credit assistance mechanism,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The overall willingness of MFI to assist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assis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ercial bank, and the willingness of traditional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government bank cooperation and credit assistance incentives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MFI's assistance to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nd the risk of microcredit for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The effectiveness of assistanc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credi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assistan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FI, further optimiz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microcredit policie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polici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MFI,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income generation ability and credit awareness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Keywords:**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 poverty alleviation population; microcredit; help willingness

党的二十大要求,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金融扶贫是我国扶贫的重要力量,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向脱贫户发放小额贷款,支持脱贫户的生产活动,助其增收。为突出这些金融机构对脱贫户帮扶的政策工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文中将通过小额贷款对脱贫户进行帮扶的金融机构称为小额信贷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为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和稳定增收,2021年3月,财政部等部门下发《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6号),要求继续坚持并进一步优化完善帮扶措施。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2022年我国脱贫人口小额贷款累计发放933.5亿元,同比增长24%。作为政府实施精准帮扶政策的代理人,MFI在通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对脱贫户的帮扶过程中,仍面临信贷风险较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降低MFI帮扶的积极性,导致脱贫户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MFI利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如何?帮扶意愿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帮扶意愿?回答这些问题,对继续落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执行“四不摘”的工作要求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围绕MFI的帮扶意愿、激励机制及驱动因素,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MFI帮扶意愿水平,典型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考察MFI帮扶意愿,发现MFI参与帮扶的意愿水平较低,如曾小溪等<sup>[1]</sup>、张颖慧等<sup>[2]</sup>、Sagamba等<sup>[3]</sup>;另一类是MFI的服务目

标群体定位,间接考察扶贫意愿,研究发现MFI扶贫存在目标偏移<sup>[4]</sup>和“精英俘获”<sup>[5]</sup>,将贫困群体排除在小额信贷服务之外。也有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小额信贷项目成功地排除了非贫困户的参与<sup>[6]</sup>。关于MFI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在:通过横向监督<sup>[7-8]</sup>、连带责任<sup>[9]</sup>、社会担保与监督<sup>[10]</sup>等团体贷款机制化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形成最优分离契约和最优混合契约;通过重复贷款<sup>[11]</sup>、重复性的分期付款安排<sup>[12]</sup>等动态机制,降低MFI的信贷风险;声誉效应<sup>[13-14]</sup>也有助于提高小额信贷的还款率。针对MFI扶贫意愿驱动因素的研究,张颖慧等<sup>[2]</sup>的问卷调研结果表明,性别、教育背景、收入满意度、信贷决策自主性、放贷任务以及是否完成任务对信贷扶贫业务有显著影响,性别和信贷自主权对扶贫意愿具有显著影响;Alain等<sup>[15]</sup>指出,MFI为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并维持自身经营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决定扶贫意愿的前提;Bateman<sup>[16]</sup>则认为,女性董事越多的MFI,扶贫意愿越高;曾小溪等<sup>[1]</sup>指出,金融扶贫低收益与高成本之间的矛盾是金融机构开展扶贫小额贷款业务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曾庆捷<sup>[17]</sup>指出,集中动员机制嵌入到官僚制的日常运作,是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推动力,但在干部管理、产业发展可持续等方面存在局限。已有研究对阐释MFI对脱贫户的信贷帮扶意愿具有重要价值。然而,针对“后精准扶贫时代”的MFI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文献还不多见。鉴于此,调查MFI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基于政银关联和委托代理的视角阐释MFI帮扶意愿的形成逻辑,

采用 Ologit 排序模型,对 MFI 帮扶意愿的形成逻辑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政策决策部门把握 MFI 落实脱贫小额信贷政策的积极性。

## 1 MFI 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形成与变化逻辑

MFI 是公众性、社会性较强的特殊企业,需承担执行货币政策、遵循赤道原则、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持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通过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业务进行扶贫开发,也是 MFI 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此外,由于金融精准帮扶是一种特殊的扶贫开发模式,其帮扶工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前身为扶贫小额信贷)有别于传统小额信贷扶贫。从《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78号)和《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6号)可看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嵌入、目标群体精准锁定的政策性扶贫信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属性从根本上影响 MFI 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一方面,金融精准帮扶是 MFI 的政治使命,通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对脱贫户的帮扶有政治属性,因此 MFI 与政府的关系属性会影响 MFI 的帮扶意愿;另一方面,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自上而下的实施机制,使得政府与 MFI 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也会直接影响 MFI 的帮扶意愿。

### 1.1 政银关联中 MFI 帮扶意愿的形成与变化逻辑

1) 国有产权属性是决定 MFI 帮扶意愿的基础。MFI 资产的国有属性是政银关联的主要形式之一。银行产权结构的典型特点是公共资金注入、核销和剥离不良资产<sup>[18]</sup>。大型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银行机构主要由中央、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控股。MFI 的国有产权属性要求 MFI 服从于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积极执行落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对脱贫户进行帮扶。

2) 管理控制权的政银关联直接作用于 MFI 的帮扶意愿。动员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模式的典型特征,中央政府由上至下动员各种市场与非市场要素参与到精准扶贫行动中,MFI 也是被动员的主要力量之一。MFI 的传统信贷扶贫具有“精英俘获”的特点,对深度贫困往往具有扶贫惰性。为提高 MFI 帮扶积极性,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创新政策性小额信贷产品,动员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调动帮扶积极性,推动落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

MFI 金字塔式的集权体制会促进精准帮扶的动员效果。在这种集权体制下,部分 MFI 高管的任免权、否决权等关键控制权会向上、向心集中。政府正是利用这种集权体制,对 MFI 进行动员,使其响应对脱贫户的帮扶号召,从而形成帮扶意愿。MFI 响应帮扶动员的结果包括高管获得晋升机会、避免惩戒或淘汰等。在上级机构的后发制人策略下,MFI 高管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不响应或不积极响应,很可能被否决甚至免职。因此,推论高管的政治背景也会对 MFI 的帮扶意愿产生积极影响。例如,MFI 高管的政治身份可能会左右其管理决策。目前,我国多数 MFI 设置党委等党政机关和党支部书记等行政职务,高管的任命或选派通常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政治面貌往往成为其中的优选条件。另一方面,在“晋升锦标赛”<sup>[19]</sup>的治理模式下,MFI 高管受到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和“届别机会主义”的影响,会做出积极的帮扶决策。

然而,动员模式通常具有参与者亢奋程度不同、持续时间短等特点,一方面,面对上级部门的动员,不同类别 MFI 的执行意愿程度不同;另一方面,面对相同的激励,MFI 帮扶意愿的持续时间可能不同。当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显现出较好的帮扶效果时,政府会对这种政策产生依赖,反复采用这一政策模式。此时,被动员者对激励可能产生免疫力,动员不再有效,MFI 对政策的执行意愿就可能表现为虚张声势甚至阳奉阴违的情况。

由此推出假设 H1: 政银关联程度对 MFI 的帮扶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 1.2 委托代理关系中 MFI 帮扶意愿的形成与变化逻辑

由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实施机制可知,MFI 对脱贫户的帮扶机制是委托代理机制。如图 1 所示,其委托代理关系链条是,中央政府是脱贫帮扶的最高委托人,主要负责设计顶层帮扶政策和监督考核机制,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中央机构先后出台《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78号)、《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号)和《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6号)等帮扶政策;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委托,因地制宜地制定帮扶对象的识别、建档、信贷资格等实施方案,是中央政府进行脱贫帮扶的代理人;同时作为委托人,委托 MFI 执行具体的帮扶方案,进行精准帮扶;MFI

则是脱贫帮扶的最终代理人,接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执行制定的帮扶政策和实施方案,具体负责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业务开展、风险控制等经营运作。因此,在关系链条中,中央政府是最高委托人;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精准帮扶的代理人,也是MFI的委托人;MFI是最终代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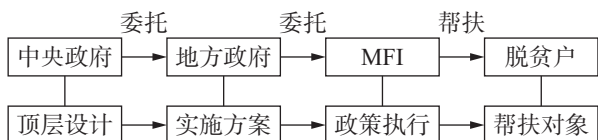


图1 MFI对脱贫户帮扶的委托代理关系链条

Fig. 1 MFI's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chai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ssistance

在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方面,多层级的行政体制可能导致的“碎片化威权主义”、顶层设计所赋予的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在促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可能会降低MFI的帮扶意愿。这是因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财务可持续性、信贷风险水平和信贷帮扶效果三者的均衡状况,是MFI进行帮扶决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各层级和MFI各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监管人员和MFI存在合谋,致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难以主动落实,作为理性的利益主体,在选择社会责任和财务目标之间,MFI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此,将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纳入绩效评估,明确地方官员和金融机构高管对脱贫户帮扶的责任,通过设立奖励和激励措施,向地方和MFI释放中央的政策倾向信号,对各层级进行显性干预,可有效提高MFI的帮扶意愿。

由此提出假设H2: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政策激励可以提高MFI帮扶的积极性。

## 2 MFI帮扶意愿的现状分析

### 2.1 调查方案

为了掌握MFI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情况,通过对MFI高管的定向问卷调查,获得样本数据。依据前文MFI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形成与变化逻辑,由于高管个人特征、MFI特征、帮扶意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绩效与风险等可能会对MFI的帮扶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将这些方面作为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调查方式为通过微信、QQ、电子邮件等线上形式发放调查问卷。由于本调查是金融机构定向调查,考虑到调查问卷的地区可及性和MFI及脱贫户的地区属性,调查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浙江、

安徽、江西、四川和吉林等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商业银行等MFI是脱贫户精准帮扶的主体,为确保机构类型调查的全面性,将其作为主要调查对象。本调查共发放1000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8%。其中,获取部门经理及以上的问卷692份,在对问卷进行筛选后,剔除问题遗漏过多、答题不合理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54份,问卷有效率为80.06%。

### 2.2 MFI的帮扶意愿情况

为获取MFI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在问卷中设计“您认为,您所在机构对已脱贫农户继续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意愿如何?”,以MFI高管的判断来判定MFI的帮扶意愿情况。最终筛选的数据为MFI部门经理及以上高管,故高管的判断可作为MFI帮扶意愿决策的无偏估计。帮扶意愿是一种主观倾向,故将选项进行定序量化,并由小到大进行赋值,分为非常消极=1、消极=2、一般=3、积极=4、非常积极=5等5个等级。选项赋值越大,代表MFI的帮扶意愿越强。

调查结果(表1)显示MFI的帮扶意愿呈现2个特征:帮扶的总体意愿程度较低,仅42.78%的MFI的意愿为“积极”和“非常积极”,高达49.28%的样本的意愿为“一般”,仍有7.94%的MFI表达“消极”和“非常消极”的意愿;帮扶意愿存在明显的机构差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相对强烈。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帮扶意愿最高,“积极”和“非常积极”样本占56.25%;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和“非常积极”样本占48.27%,高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占比(44.90%);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帮扶意愿相对较低,分别有38.66%和33.90%的样本为“积极”和“非常积极”。

高管个人帮扶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MFI的决策,因此,问卷还关注了MFI高管个人的帮扶意愿情况。调查结果如表2,3。由表2,3可看出:MFI女性高管的帮扶意愿高于男性,“积极”和“非常积极”的帮扶意愿占比分别为44.97%和42.25%;MFI中共党员高管的帮扶意愿最强,“积极”和“非常积极”的帮扶意愿占比为48.37%,其余依次为群众、共青团员和其他党派。

表1 MFI的帮扶意愿情况

Tab.1 MFI's willingness to assist

金融机构	占比/%				
	非常消极	消极	一般	积极	非常积极
商业银行	2.00	4.00	55.00	30.00	9.00
邮政储蓄银行	6.78	3.39	55.93	27.12	6.78
村镇银行	0	3.70	51.85	18.52	25.93
农村信用合作社	6.67	0	53.33	40.00	0
农村商业银行	1.04	4.17	38.54	38.54	17.71
贷款公司	9.09	9.09	36.36	36.36	9.09
农村合作银行	4.26	10.64	42.55	42.55	0

表2 高管帮扶意愿的性别差异

Tab.2 Gender differences in executive support willingness

性别	占比/%				
	非常消极	消极	一般	积极	非常积极
男	3.00	5.39	49.66	31.69	10.56
女	2.00	2.01	51.01	31.54	13.42

表3 高管帮扶意愿的政治面貌差异

Tab.3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executives' willingness to assist

政治面貌	占比/%				
	非常消极	消极	一般	积极	非常积极
群众	3.60	3.60	52.20	28.83	11.71
共青团员	3.33	3.33	65.00	19.17	9.17
中共党员	2.17	3.80	45.65	37.50	10.87
其他党派	0	42.86	42.86	0	14.29

### 3 MFI对脱贫户帮扶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3.1 变量选择

根据MFI帮扶意愿形成的理论逻辑,选取核心解释变量、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别如表4、5。

1) 被解释变量( $I_w$ ),前文已述及,在此不赘述。

2) 核心解释变量

对政银合作的态度( $G_b$ )。政银关联程度是影响MFI帮扶意愿的主要因素,MFI倾向于政银合作时,会表现出积极的帮扶态度。因此,采用MFI对政银合作的态度作为政银关联的代理变量,问卷设置的相应问题为“您所在机构对政银合作的态度如何?”,备选项为非常消极、消极、一般、积极和非常积极5个等级。按照合作态度的积极性由低到高赋值1至5,赋值越高,MFI政银合作态度越积极。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激励程度( $P_o$ )。委托代

理关系中,MFI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主要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程度有关。因此,采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程度作为委托代理的代理变量。调查问卷中,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对您所在单位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激励程度如何?”反映,并提供“非常小、小、一般、大和非常大”5个选项,依次赋值1至5。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程度随着选项值的增大而增大。

3) 其他解释变量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水平( $R_s$ )。脱贫户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加之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无抵押无担保的借款条件,MFI会面临较高的信贷风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脱贫户的违约风险水平越高,MFI的帮扶意愿会越低。对该变量设置的问卷为“与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相比,您认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信贷风险如何?”,选项为非常低、低、一般、高和非常高,依次赋值1至5,赋值越高,说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越大。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帮扶效果( $E_t$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帮扶效果主要体现为对脱贫户生产能力培育和收入增长的作用。在锦标赛机制的作用下,绩效考核通过绩效反馈方式对代理人产生激励作用。作为代理人,当MFI发放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产生较好的帮扶效果时,政府采取的薪酬奖励、职位晋升、名誉奖励等正向绩效反馈方式会进一步发挥物质和精神激励作用,MFI会表现更强的帮扶意愿。反之,惩罚、通告等负向绩效反馈方式会降低代理人的帮扶积极性。问卷中对帮扶效果同样划分为“非常差、差、一般、好、非常好”5个档次,依次赋值1至5。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性( $S_o$ )。反映MFI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对应的问题是“您认为本单位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是否可持续?”。当这种预期倾向于乐观时,会产生积极的帮扶意愿;反之则反是。该变量为二值变量,具体赋值为否=0,是=1。

4) 控制变量

MFI高管具有经济人的非理性特征,年龄、性别、文化水平、政治面貌、任职经历、工作年限等属性都会影响个人的价值观,而高管个人的价值观对管理决策有重要影响<sup>[20]</sup>。在这里,将MFI部分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年龄( $M_a$ )。MFI对脱贫户的信贷帮扶,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一般而言,年龄越大的高管,可能越倾向于遵守道德伦理原则,注重声誉,进而倾向于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李婷<sup>[21]</sup>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大,越注重自己的声誉。因此,判断年龄越高的MFI高管,越倾向于帮扶。

性别( $G_e$ )。一般而言,个体的人文关怀具有性

别差异。女性高管由于其敏感、天生的母性而具有较强的和善心,往往比男性高管更具有人文关怀。Manner<sup>[22]</sup>的研究报告显示,女性高管能够改变管理团队的价值观,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表4 变量说明

Tab. 4 Variable declara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赋值
被解释变量	MFI帮扶意愿	$I_w$	1=非常消极; 2=消极; 3=一般; 4=积极; 5=非常积极
核心解释变量	对政银合作的态度	$G_b$	1=非常消极; 2=消极; 3=一般; 4=积极; 5=非常积极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激励程度	$P_o$	1=非常小; 2=小; 3=一般; 4=大; 5=非常大
其他解释变量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水平	$R_s$	1=非常低; 2=低; 3=一般; 4=高; 5=非常高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帮扶效果	$E_f$	1=非常差; 2=差; 3=一般; 4=好; 5=非常好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性	$S_u$	1=是; 0=否
控制变量	年龄	$M_a$	1=25岁以下; 2=25~35岁; 3=36~45岁; 4=45以上
	性别	$G_e$	0=男性; 1=女性
	文化水平	$E_d$	1=高中及以下; 2=大专; 3=大学本科; 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政治面貌	$M_o$	1=群众; 2=共青团员; 3=其他党派; 4=中共党员
	政府任职经历或职位是否由政府指派	$G_{er}$	1=是; 0=否
	工作年限	$Y_e$	1=5 a及以下; 2=6~10 a; 3=11~15 a; 4=15 a以上

表5 描述性统计

Tab.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预期作用方向
$I_w$	3.474	0.845	5	1	-
$G_b$	3.982	0.940	5	1	+
$P_o$	3.697	0.809	5	1	+
$R_s$	3.134	0.922	5	1	-
$E_f$	3.324	0.750	5	1	+
$S_u$	0.737	0.441	1	0	+
$M_a$	2.184	0.871	4	1	+
$G_e$	0.287	0.452	1	0	+
$E_d$	3.108	0.545	4	1	+
$M_o$	2.321	0.813	4	1	+
$G_{er}$	0.111	0.314	1	0	+
$Y_e$	2.082	1.080	4	1	-

注: +, -分别表示正向和负向。

文化水平( $E_d$ )。需求层次论认为,企业高管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通过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来满足自身需求。Manner<sup>[22]</sup>指出,教育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学历越高的高管决策时会考虑MFI的长远发展,不会只注重短期利益。因此,初步判定文化水平越高,MFI越倾向于帮扶。

政治面貌( $M_o$ )。对贫困户的帮扶是一项政治任务,高管的政治面貌对MFI的帮扶决策具有积极影响。这里将政治面貌分为群众、共青团员、其他党派和中共党员,并分别赋值为1至4,其对MFI帮扶意愿作用依次升高。

是否具有政府任职经历或职位是否由政府指派( $G_{er}$ )。“旋转门”是金融行业的一种典型现象,因此,MFI高管的任职背景可反映MFI与政府之间的关联状况,这种关联状况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激励。一方面,高管与政府关联程度越高,可能更重视与政府关系的维系,在政府赋予的帮扶任务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另一方面,高管与政府关联程度越高,行政晋升激励和声誉机制的激励,也会使高管具有推动MFI对贫困户帮扶。具有政府任职经历或职位是由政府指派,赋值为1;否则为0。

工作年限( $Y_e$ )。一般而言,工作年限越长,高管的决策越具有权威性<sup>[23]</sup>。然而,任职时间较长的企业高管,也可能将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和高效率作为决策的首要选择,决策更加偏重于短期利益,忽视社会责任。该变量设置为定序变量,高管工作年限为5 a及以下,赋值为1;工作年限6~10 a,赋值为2;11~15 a工作年限,赋值为3;高管工作年限15 a以

上,赋值为4。需要说明的是,工作年限采取化零为整的方法确定,即工作年限处于5~6 a间的视为6 a,处于10~11 a间的视为11 a。

### 3.2 模型构建

将MFI帮扶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是一个有序变量,适宜采用排序模型Ologit或者Oprobit模型。由于样本数据服从逻辑概率分布,满足Ologit模型假设,加之解释变量均主要是分类变量,选用有序响应模型(Ologit模型)。

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在 $\{1,2,3,4,5\}$ 上取值的有序响应,关于被解释变量 $y$ 与解释变量 $x$ 的Ologit模型可通过潜变量模型推导。引入1个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 $y_i^*$ ,且 $y_i^*=x\beta+e$ , $\beta$ 为 $k$ 阶向量,残差 $e$ 服从逻辑分布。假设 $\gamma_1$ 至 $\gamma_{j-1}$ 为未知的 $j-1$ 个切割点,且 $\gamma_1<\gamma_2<\dots<\gamma_{j-1}$ , $y$ 与潜在变量 $y_i^*$ 的对应关系为:

$$y = \begin{cases} 1, & y_i^* \leq \gamma_1 \\ 2, & \gamma_1 < y_i^* \leq \gamma_2 \\ 3, & \gamma_2 < y_i^* \leq \gamma_3 \\ 4, & \gamma_3 < y_i^* \leq \gamma_4 \\ 5, & \gamma_4 < y_i^* \leq \gamma_5 \end{cases} \quad (1)$$

由于残差 $e$ 服从逻辑分布,可在给定解释变量 $x$ 为条件时,对 $y$ 的分布表达式进行求解,得出其响应概率,具体如下:

$$P(y=1|x) = P(y^* \leq \gamma_1|x) = \Phi(\gamma_1 - x\beta) \quad (2)$$

$$P(y=2|x) = P(\gamma_1 < y^* \leq \gamma_2|x) = \Phi(\gamma_2 - x\beta) - \Phi(\gamma_1 - x\beta) \quad (3)$$

$$P(y=3|x) = P(\gamma_2 < y^* \leq \gamma_3|x) = \Phi(\gamma_3 - x\beta) - \Phi(\gamma_2 - x\beta) \quad (4)$$

$$P(y=4|x) = P(\gamma_3 < y^* \leq \gamma_4|x) = \Phi(\gamma_4 - x\beta) - \Phi(\gamma_3 - x\beta) \quad (5)$$

$$P(y=5|x) = 1 - P(y^* \leq \gamma_5|x) = 1 - \Phi(\gamma_5 - x\beta) \quad (6)$$

故而, $P(Y_i > i) = \Phi(\gamma_i - x\beta) = \frac{\exp(\gamma_i - x\beta)}{1 + \exp(\gamma_i - x\beta)}$ ,其中, $i=1, 2, 3, 4$ 。

由此可建立如下Ologit理论模型:

$$\ln p_k = \alpha_{ki} + \beta_1 G_{bi} + \beta_2 P_{oi} + \beta_3 R_{si} + \beta_4 E_{fi} + \beta_5 S_{wi} + \sum_{j=1}^3 \gamma_j I_{n_{ji}} + \sum_{j=1}^6 \delta_j x_{ji} + \varepsilon_i \quad (7)$$

其中: $p_k$ 为MFI帮扶意愿 $I_w = k$ 时的概率,表示帮扶意愿程度等级。需说明的是,帮扶效果( $E_f$ )较好时,脱贫户的还款能力会提升,信贷风险( $R_s$ )会降低;信

贷风险较小时,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持续性( $S_w$ )也会提高;同样,帮扶效果( $E_f$ )与信贷业务可持续性( $S_w$ )存在正向交互作用。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三者的交互项 $I_w$ ,反映三者的交互作用对MFI帮扶意愿的调节效应。 $x$ 为控制变量,代表MFI高管的个体特征; $\varepsilon_i$ 为随机扰动项; $\alpha_k$ 为 $I_w = k$ 时的截距; $\beta, \gamma, \delta$ 均为待估系数; $i$ 表示第 $i$ 个MFI。

### 3.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3.3.1 样本信效度检验

由于数据来源于自编问卷及随机调查,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采用最常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采用克隆巴赫信度(Cronbach  $\alpha$ )系数法进行检验,作为信度指标,其能克服折半法的缺点。Cronbach  $\alpha$ 系数大于0.7,问卷或量表的信度较好;Cronbach  $\alpha$ 系数大于0.6,问卷不失价值,但需修订;Cronbach  $\alpha$ 系数小于0.6,问卷需重新设计。检验结果显示,政银合作、帮扶政策激励变量和小额信贷业务变量的Cronbach  $\alpha$ 值分别为0.80, 0.81和0.77,信度系数均在0.75以上,表明调查回收的问卷及数据是可信的。进而,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当KMO系数大于0.5,调查问卷数据及结构可靠。结果显示,KMO系数为0.782,显著性小于0.05,表明设计问卷的结构可靠有效。

#### 3.3.2 回归结果分析

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采用逐步估计法对解释变量的参数进行估计,选择稳健标准误估计方式,结果如表6。其中,模型1是Ologit理论模型,模型2是模型1的基础上删减政银合作( $G_b$ )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剔除信贷风险( $R_s$ )、帮扶效果( $E_f$ )和业务可持续性( $S_w$ )等信贷业务特征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剔除高管特征变量。

综合分析表6可发现:逐步调整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基本保持不变,参数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Ologit模型是非线性回归模型,故采用Wald检验来验证解释变量间的联合显著性,结果显示 $p$ 值小于0.01,联合显著,模型拟合程度良好。进而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91,远小于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模型1, 3, 4的估计结果可看出:政银合作( $G_b$ )分别在5%, 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估计参数均为正值,说明政银关联程度越大,MFI帮扶意愿越强。原因在于,政府与MFI的关系越紧密,政府越易获取MFI的帮扶信息,越能加强

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开展情况的监督;同时, MFI的业绩与地方政府存在很大关系,在银行业高度竞争压力下,为争取政府客户、监管收益及货币

政策定向激励,作为帮扶代理人的MFI倾向于向政府发送积极信号,积极响应政府帮扶动员,提高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综上可见,H1得到证实。

表6 模型估计结果

Tab. 6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G_b$	0.406** (0.201)		0.497*** (0.188)	0.339* (0.192)
$P_o$	0.479*** (0.179)	0.723*** (0.139)	0.663*** (0.181)	0.519*** (0.180)
$R_s$	-0.912*** (0.162)	-0.941*** (0.161)		-0.998*** (0.157)
$E_f$	0.627*** (0.168)	0.627*** (0.169)		0.581*** (0.163)
$S_u$	0.373** (0.156)	0.395** (0.157)		0.357** (0.153)
$R_s * E_f$	-0.903** (0.411)	-0.333*** (0.053)		-0.674* (0.408)
$R_s * S_u$	-0.529* (0.377)	-0.412** (0.198)		-0.065* (0.033)
$E_f * S_u$	0.044* (0.029)	0.166** (0.071)		0.228* (0.136)
$M_o$	0.072* (0.037)	0.074* (0.038)	0.004** (0.002)	
$G_{er}$	0.146 (0.304)	0.108 (0.313)	0.560** (0.282)	
$M_a$	-0.226 (0.228)	-0.234 (0.230)	-0.144 (0.207)	
$G_{er}$	0.376* (0.223)	0.277 (0.217)	0.355* (0.207)	
$E_d$	-0.219 (0.243)	-0.192 (0.246)	0.0002 (0.221)	
$Y_c$	0.150 (0.192)	0.188 (0.194)	0.148 (0.169)	
Observations	594	594	594	594

注:\*\*\*, \*\*, \*分别表示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模型1~4的政策激励变量( $P_o$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均为正值。说明信贷贴息、坏账损失补贴等政策措施发挥显著的激励作用,对MFI帮扶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些激励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实施信贷风险控制机制,贷款贴息、坏账补偿和明确政府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比例等,借此降低MFI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面临的信贷风险;实施信贷项目服务和管理机制,县、乡镇、村三级联动,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提供贷前政策宣传、贷款申报和信用评级、贷中贷款使用监督和贷后贷款回收等信贷管理服务,降低MFI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信贷交易成本;积极利用货币政策的定向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加大支农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MFI扩大对脱贫户的信贷投放;建立实施尽职免责机制,明确尽职要求,强化正面导向,调动MFI投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因此H2成立。

模型1, 2, 4的估计结果显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业务绩效与MFI帮扶意愿具有显著的关系;信贷风险( $R_s$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与MFI的帮扶意愿负相关程度较大,模型的负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说明MFI帮扶意愿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负向敏感程度较高,帮扶决策中,MFI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风险水平。

帮扶效果( $E_f$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MFI帮扶意愿正相关。说明帮扶效果越好,MFI对脱贫户

的帮扶越有动力。这可能主要源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实施的监督考核机制发挥出对MFI的激励约束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通过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进行统计监测,并对MFI进行外部评估考核;同时MFI将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纳入内部考核,考核结果通过通告、限期整改和督导问责等反馈。在这种作用机制下,薪酬激励、职位晋升、声誉机制等对MFI发挥激励约束效果,随帮扶效果的改善,MFI的帮扶积极性增强。

信贷风险、帮扶效果和信贷业务可持续性3个变量的交互项在不同模型中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信贷风险与帮扶效果、信贷业务可持续性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信贷风险增大会分别降低帮扶效果和可持续性对帮扶意愿的正向作用;帮扶效果和信贷业务可持续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帮扶效果与信贷业务的交互作用会强化对二者帮扶意愿的提升作用。

高管特征变量对MFI帮扶意愿的影响总体显著性较低。其中,高管性别( $G_c$ )变量参数在模型1和模型3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说明MFI的帮扶意愿受到女性高管的正向影响;在模型1~3中,高管的政治面貌对帮扶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比较小,3个模型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07200, 0.07350, 0.00448;高管任职经历仅在模型3中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管的政府履职经历有助于提高MFI的帮扶意愿。

### 3.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和替换理论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与理论模型。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设计问卷时,设置与帮扶意愿相关联的问题,即“与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相比,您所在机构是否会倾向于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选是赋值1,否赋值0。是否倾向于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也可直接反映MFI的帮扶意愿。为此,将被解释变量帮扶意愿( $I_w$ )替换为帮扶倾向( $T_e$ )。由于被解释变量转换为二值变量,原理论模型相应变为Logit模型。

2)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为提高样本的有效性,针对核心解释变量同样设置关联检验问题,对政银关联的检验问题设置为“您对开展政银合作这种模式的满意度是——分?(请填1~5数字打分,满分为5分)”;针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激励程度,问卷中关联的检验问题为“您所在机构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政府激励措施满意度为——分?(请填1~5数字打分,满分为5分)”;关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检验问题是“您所在机构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量如何?”,对应选项为“较多”和“较少”,分别赋值1和0;与帮扶效果关联的检验问题是“与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相比,您是否认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更能促进精准帮扶?”,是则赋值1,否赋值0;与信贷业务可持续性( $S_u$ )关联的检验问题是“您认为所在机构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前景如何?”,选项分别为非常消极、消极、一般、乐观和非常乐观,并依次赋值为1至5。这里用政府激励措施满意度( $S_a$ )、政银合作满意度( $G_{bs}$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量( $B_u$ )、促进精准帮扶( $P_r$ )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开展的前景( $F_u$ )分别替换原有模型中的政策激励程度( $P_o$ )、对政银合作的态度( $G_b$ )、信贷风险( $R_s$ )、帮扶效果( $E_r$ )和信贷业务可持续性( $S_u$ )等核心解释变量。上述2种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如表7。

表7 稳健性检验

Tab. 7 Results of robust tests

替换被解释变量: 帮扶倾向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G_b$	0.261* (0.159)	$G_{bs}$	0.294* (0.193)
$P_o$	0.866*** (0.225)	$S_a$	0.259** (0.116)
$R_s$	-0.002* (0.002)	$B_u$	0.091* (0.060)
$E_r$	0.920*** (0.195)	$P_r$	0.939** (0.477)
$S_u$	0.661* (0.352)	$F_u$	0.594** (0.298)
Observations	594	594	594

由表7可看出:在变换理论模型和被解释变量后,原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采用原理论模型并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激励措施满意度、信贷业务量、促进精准帮扶和信贷前景变量依然保持与原有变量同质的解释度。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相应结论是稳健的。

### 3.3.4 内生性检验

需进一步考虑的是,以上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及无法精确度量的解释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带有工具变量的Ologit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选择MFI规模扩张程度( $S_c$ )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MFI政银关联和对政策激励程度的评价会受到规模扩张程度的影响,MFI规模扩张程度提高时,股本的扩充会稀释MFI的国有产权,也会降低MFI对帮扶政策激励的评价;MFI规模扩张程度对MFI帮扶意愿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对应的调查问题是“您所在的机构的规模扩张程度如何?”选项依次为非常低、低、一般、高和非常高,分别赋值1至5。

表8,9中模型1,3,2,4所在的列分别为政银关联和政策激励对MFI帮扶意愿的OLS及2SLS估计结果。从模型1和3可知:规模扩张程度与政银关联和政策激励显著负相关,即MFI规模扩张程度越高,MFI的政银关联程度和对政策激励程度的评价越小, $F$ 统计值分别为142.77,212.62,远超10,说明规模扩张程度不是政银关联和政策激励的弱工具变量。从模型2和4可知:政银关联和政策激励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8 内生性检验:第一阶段回归

Tab. 8 Endogeneity test: phase 1 regression

模型1(被解释变量: $G_b$ )	模型3(被解释变量: $P_o$ )	
$S_c$	-0.031*** (0.002)	-0.016*** (0)
Controls	Yes	Yes
$F$ 值	142.77	212.62

表9 内生性检验:第二阶段回归

Tab. 9 Endogeneity test: phase 2 regression

模型2( 被解释变量: $I_w$ )		模型4 (被解释变量: $I_w$ )	
$G_b$	0.373*** (0.105)	$P_o$	0.451*** (0.117)
Controls	Yes	Controls	Yes
Wald $\chi^2$	59.27	Wald $\chi^2$	65.83

### 3.3.5 异质性检验

由前文可知,不同类型的MFI对脱贫户的帮扶

意愿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MFI对政银关联和委托代理的响应差异造成的。为此,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的划分标准,将MFI划分为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MFI帮扶意愿形成的异质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其中,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由表10可知:政策激励对MFI帮扶意愿的正向作用存在机构差异, $P_0$ 的系数分别为0.322,0.172和0.063,政策激励对传统金融机构帮扶意愿的正向推动作用最大、其次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最小为商业银行,原因在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三农为服务对象,支农和扶贫意识较高,其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对激励政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政银合作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原因在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时间较短,期望争取与政府的合作获得优惠的政策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较强,市场相对稳定,使其帮扶意愿对政银合作敏感性相对较低。

表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 10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s

变量	传统农村 金融机构	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
$P_0$	0.322*** (0.039)	0.172*** (0.011)	0.063** (0.029)
$G_b$	0.128** (0.051)	0.406** (0.212)	0.078** (0.037)
$R_s$	-0.809* (0.472)	-0.943 (0.909)	-0.251* (0.161)
$E_f$	0.717*** (0.080)	0.373* (0.178)	0.325 (0.311)
$S_u$	0.281** (0.156)	0.144* (0.085)	0.003 (0.277)
高管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方面,信贷风险对MFI帮扶意愿仍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帮扶意愿负面影响最大,对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负面影响次之,对商业银行帮扶意愿的负面影响最小。这可能是由于机构的规模差异和抗风险能力不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最弱,其帮扶意愿对风险的负向敏感性更强;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其帮扶意愿对风险的负向敏感性较小。在对帮扶效果的敏感性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帮扶意愿的敏感性最强,说明传统金融机构更重视帮扶效果,商业银行次之;信贷业务可持续性对传统金融机构帮扶意愿正向作用

最大,对新型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正向作用次之,对商业银行的帮扶意愿影响则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扶贫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 4 结论和政策启示

### 4.1 结论

基于MFI帮扶意愿形成的理论逻辑,对MFI帮扶意愿现状进行分析,采用Ologit排序模型实证分析影响MFI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主要因素,所得主要结论如下:

1) 以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为基础的政银关系和信贷帮扶机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影响MFI对脱贫户帮扶意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所有权关联程度越高,管理控制权越集中,对脱贫户帮扶动员的效果越好,但MFI帮扶意愿会随着动员亢奋程度衰减,也会随着动员的持续而降低,随着金融集权体制中控制权链条的延长而由上及下衰减;另一方面,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及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帮扶意愿的提高,对MFI采取激励措施会提高其帮扶意愿。

2) MFI帮扶意愿程度总体较低,存在明显的机构差异,农村金融机构对脱贫户的帮扶意愿高于商业银行,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高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3) 政银合作、政策激励、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帮扶效果及业务可持续性对MFI帮扶态度的影响显著。当MFI对政银合作态度积极或加大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政策激励时,MFI的帮扶意愿显著提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对MFI的帮扶意愿具有较大的负向作用;帮扶效果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性的提升,有助于提高MFI的帮扶积极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激励政策对传统金融机构帮扶意愿的正向作用显著高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政银合作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正向作用显著高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帮扶积极性的阻碍作用最突出,帮扶效果的提升最能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帮扶意愿,信贷业务可持续性对传统金融机构帮扶意愿正向作用最大。

### 4.2 政策启示

1) 应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教育培训,继续加强对脱贫户的金融支持动员,进一步完善金融政策和监管法规,明确MFI的社会责任;建立和实施科学的社会绩效考评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社会绩效管理 and 监督考核,不断提高MFI的社会责任意识,

推动其持续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

2) 进一步优化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适度提高脱贫(扶贫)小额信贷等政策性小额信贷的信贷风险容忍度,适度放宽对小额信贷机构脱贫帮扶贷款的不良率考核。二探索优化财政与金融协同扶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贷款贴息方式和管理制度,加大中国人民银行对MFI的定向再贷款力度。三通过财政资金存放、政策合作等形式,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大与积极参与帮扶小额信贷机构的合作力度,给与一定的财政政策支持。完善地方政府和小额信贷机构对信贷风险的分担机制,提高政府对帮扶信贷风险的财政补偿力度,提升小额信贷机构对脱贫户帮扶的积极性。同时,严格落实各层级单位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考核制度和惩戒通报制度,通过严格的约束机制提高小额信贷机构对脱贫户帮扶的积极性。四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制定和出台脱贫帮扶的尽职免责和奖励措施,激发小额信贷人员创新和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业务的积极性。五针对不同MFI帮扶意愿存在的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尤其提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帮扶意愿。

3) 提高脱贫户的生产创收能力和信用意识。根据地区产业布局和发展基础,对脱贫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技能和技术培训,通过技术引进、生产指导、咨询服务等提高脱贫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收能力;深入总结并推广脱贫小额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探索小额信贷机构政策嵌入下公司与脱贫户的合作模式,发挥小额信贷政策的杠杆作用,促进脱贫户参与到龙头企业和产业大户的生产过程中,拓展收入来源;小额信贷机构应深入脱贫户,广泛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提高相对贫困地区人口的金融知识水平和信用意识;引导小额信贷机构获取脱贫户等贫困人口信息,完善农村信用体系,通过正面宣传、贷款利率优惠等方式,对信贷履约正面典型给予鼓励和引导,通过声誉和财务奖励机制提高脱贫户的信用意识。

#### 参考文献:

- [1] 曾小溪,孙凯.精准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落实研究:基于宁夏的调研[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4):87-92.
- [2] 张颖慧,聂强.小额信贷经理人愿意精准扶贫吗?:基于西北地区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经验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6):136-143.
- [3] SAGAMBA M, SHCHETININ O, YUSUPOV N. Do microloan officers want to lend to the less advantaged? 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42(1):182-198.
- [4] 李立平,伍思健,周勇.小额信贷客户地域差异与目标偏移[J].中国管理科学,2023,31(6):122-130.
- [5] 徐乙尹,钟鑫,申云.“精英治社”会导致农贷“精英俘获”吗[J].财经科学,2022(11):73-87.
- [6] 谭燕芝,李涛.中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8(3):74-83.
- [7] FISCHER G. Contract structure, risk-sharing, and investment choice[J]. *Econometrica*, 2013, 81(3):883-939.
- [8] 王艳梅,赵希男,孙世敏.基于动态博弈的横向监督与团队激励的关系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7,31(2):162-169.
- [9] SAGIT S B, RACHEL L. Behavioral impact of debt-output nexus in joint liability group lending: evidence from the Israeli Moshavim[J]. *Israel Affairs*, 2021, 27(3):558-576.
- [10] 陶永诚.小额信贷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小额信贷正规化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39-44.
- [11] MORDUCH J. Why finance matters?[J]. *Science*, 2011, 332(6035):1271-1272.
- [12] SANJAY J, GHAZALA M. A little at a time: the use of regularly scheduled repayments in microfinance progra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72):253-279.
- [13] 赵岩青,何广文.声誉机制、信任机制与小额信贷[J].金融论丛,2008(1):33-40.
- [14] 乐晶.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信贷与信任机制:温州钱库镇“呈会”习俗考察[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3):123-132.
- [15] ALAIN D C, MICHEL T, JULIE S.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a sampl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India[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08(79):269-299.
- [16] BATEMAN M. Why Doesn't Micro-finance Work? [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0.
- [17] 曾庆捷.从集中作战到常态推进:2020年后扶贫机制的长效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3):101-109.
- [18] 沈伯平,孙建娥.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机理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77-82.
- [19]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0] HAMBRICK D C.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 updat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2):334-343.
- [21] 李婷.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J].陇东学院学报,2023,34(3):97-103.
- [22] MANNER H M. The impact of CEO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3(1):53-72.
- [23]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Chie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 synthesis and reconcili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9):543-558.

责任编辑:丁吉海